

方詩銘文集

(第一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方詩銘文集

(第一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方詩銘先生(1919.9-2000.2)

博識通透的歷史學家

——讀《方詩銘文集》

讀後

“文革”以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老先生中，有三巨頭之說。“三巨頭”者，方、唐、湯也。方，方詩銘；唐，唐振常；湯，湯志鈞。三人專業、氣質各不相同，各有專攻，各領一個團隊，分別為古代史、上海史與近代史室主任，分別擔任所長、副所長，均成就斐然，望重史壇。論年齒，方最長，唐次之，湯殿後。我在一九八二年進所工作，有幸與三位先生有較多接觸，對他們的道德學問有些比較直接的感受。論關係，我在上海史室，與唐先生最近，交往最多，了解最深。論學問，與方先生距離最遠，最為生疏。這次方先生文集出版，先生女公子小芬令我作序，我於理於情都不能推却，也無法推却，但說實在話，視為畏途，一拖再拖，因為對於方先生的學問，我才疏學淺，難窺堂奧，不敢置喙。為了完成任務，我抱着學習、補課的態度，硬着頭皮仔細研讀了先生文集，讀着讀着，漸漸讀出了滋味，讀出了興趣，不知不覺間，從內心深處涌起一股介紹先生學術的衝動。我不能不從心底裏佩服，這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一個學問堅實的人，一個見識通透的人，一個極其睿智的人。

方詩銘先生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七日出生在成都的一個讀書做官的富庶家庭裏，祖父方頡雲是前清秀才，在貴州巡撫衙門做過文案，當過川北鹽運副使，很會經營，買了二百來畝土地，在成都置了一些房產。父親方龍伯，大學畢業後在成都稅務局、水上警察局當秘

書，母親邱又華，也是大戶人家出身。方先生是家裏獨子，下有四個妹妹，自小又身體單薄，因此格外受到父母寵愛，也被寄予很高期望。童蒙時，他就在父母教導下開始閱讀古書。方家藏書豐富，先生自小恃寵任性，隨意翻閱古書，經史子集、志怪傳奇，無所不窺，因此打下厚實的國學根底，也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先生自述，他在小學、中學，對數學沒有興趣，偏好文史，很可能與他自小就親近歷史有關。他一九四一年考入齊魯大學歷史社會學系，填報的第一志願就是歷史學。

齊魯大學是著名的美國教會大學，前身爲登州文會館，一九〇八年改名齊魯，設在濟南，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遷移成都。那時的齊魯，名師薈萃，人才濟濟，顧頡剛、錢穆、張維華、胡厚宣均執教於此，張維華擔任歷史系主任。陳寅恪、徐中舒等也在那裏兼課。先生在這裏首尾五年，從諸名師學習，如魚得水，成績優異。課餘時間，他參加編輯系刊《歷史與社會》和《文林》，^①舞文弄墨，寫過不少關於文學與歷史的文章，深受老師賞識，也鍛煉了研究歷史的才能。齊魯的學習，奠定了先生日後學術研究的基礎，打下了在史學界的豐茂人脈。先生日後在履歷表中填寫“社會關係”一欄時，通常填寫顧頡剛、張維華、胡厚宣等人，稱其關係爲“師承”，可見先生心目中對於與各位老師關係的重視。先生日後研究領域與路徑，深受各位老師影響。顧頡剛是考據學、民間文學史方面大家，胡厚宣是研究甲骨文的專家，張維華是中西交通史的專家，方先生日後治學，主要領域在

① 爲寫本文，我查閱了有關先生生平的各種資料，包括檔案。當看到先生曾經在大學辦過《文林》刊物時，我腦海裏忽然浮起一件往事：一九八六年，歷史所決定創辦所刊，一批學者在討論刊名，先生和我都是參加者。大家七嘴八舌，提了許多名稱，先生都說不好。後來，我提出叫“史林”，先生一聽，就連說“好！好！好！”最後就確定爲《史林》，先生是首任主編。先生爲什麼一聽“史林”就說好呢？現在看來，很可能這個名稱勾起了他對大學時代“文林”的聯想。不知是否如此，我們已無法起先生於地下來進行考證了，姑存此猜測。

中西交通史、民間文學史、考據學、古文字學等方面，其師承的脈絡是很明顯的。

齊魯各位老師中，對方先生人生發展路徑影響最大的，當首推顧頡剛先生。一九四五年九月，先生畢業後，在顧頡剛先生推薦下，到重慶附近的北碚，擔任北碚修志館干事，北碚修志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就是顧頡剛。一九四六年六月，顧頡剛到蘇州擔任文通書局編輯所所長，先生受顧先生之薦，到文通書局編輯所擔任編輯，舉家移居蘇州。一九四八年四月以後，先生到上海博物館工作，後來轉到文管會，推薦人是顧先生的另一位弟子童書業先生，從根子上說，還是受惠於顧先生。從成都，到重慶，到蘇州，再到上海，先生工作、生活的地方一變再變，不變的是顧先生的照拂與提携。顧先生對這位弟子特別垂青和喜歡，親自把自己的表侄女張毓芬介紹給他，日後成了方夫人。由此可見，顧先生對於方先生，不僅是學業上的恩師，而且是方先生跨出校門、走向社會關鍵階段的引路人，是欣賞方先生才學、拔識方先生的伯樂。方先生遇到這樣的恩師，可算是三生有幸！難怪先生晚年回首往事，述及最多的便是顧老先生。

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到上海工作，以後就一直生活在上海，先在博物館、文管會，一九五七年二月進入歷史所。“文革”中歷史所解散，先生到干校勞動。一九七八年歷史所恢復，先生回所，歷任室主任、所長、名譽所長、《史林》主編、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二〇〇〇年二月三日逝世，享年八十一歲。曾用名方潤、方靜若，筆名方文、林薇、石明，詳細履歷，參見書後傳略，茲不詳述。

綜觀三巨冊的《方詩銘文集》，細讀各類論著，我以爲方先生治學特點可以概括爲以下八個字：博識、堅實、通透、睿智。

博識。先生治學，不設畛域以自限，上下古今，無所不涉。上自甲骨文考辨，古本《竹書紀年》研究，金文釋義，《天問》解惑，漢簡釋

讀，下至近代小刀會起義歷史拓荒、郭沫若史學理論剖析，兩漢魏晉則是其着力最多的時段。若強分學科內容，則中西文化交通史、古代中國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都有所研究。先生之廣博，也體現在他對中外文學作品的廣泛閱讀和深厚修養方面。我曾經有幸多次聽他討論、分析問題，隨口援引巴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等人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以為談助，那熟悉的程度，宛若專家。至於中國古典文學，那更是便便腹笥，信手拈來，取之不盡，如有神助。今人一般不大知曉，先生曾經在中國文學史上下過很深功夫。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就發表過《諸宮調說唱考》、《“櫻桃青衣”的來源》、《〈好兒趙正〉話本的發現》、《論〈清平山堂話本〉及〈雨窗欹枕集〉的原名》、《〈集異記〉三種》、《論〈宣和遺事〉集成的年代》與《跋〈續幽怪錄〉》，還發表過當時屬於當代文學史範圍的《抗戰時期中國小說史的研究》。他對中國文學史一直有比較濃厚的興趣，晚年一時技癢，重作馮婦，寫過《唐白行簡〈三夢記〉考辨》、《〈霓裳羽衣〉傳自月宮的神話新解》等論文。至於研究方法，先生從無一定之規，或考據，或論理，十八般武器，順手即用，切換自如。偶爾寫一些散文，或憶故舊，或抒情思，也都情意真切，樸實雅馴，很是耐讀。

堅實。先生學術最大的特色是堅實，資料扎實可靠，方法合理，結論可信。這在他的考據論文中表現得很突出。還在大學讀書時，先生就在史學研究方面表現出非凡的才華，扎實的基礎。一九四三年，他寫成論文《論宋代說話人的家數》，牛刀小試，即獲成功。“說話人”即說書人。關於宋代說話人的分類及數目，魯迅、胡適、王國維、趙景深等人都各有說法，意見分歧。那麼多名家都關注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本身就有意義。先生在廣泛徵引、分析各種相關資料以後，對此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論文寫成以後，投給郭沫若先生在重慶主編的《中原》雜誌，被郭看中，發表在一九四五年的第一期上。郭沫若特地在文前加了案語，稱方文“列舉各家見解，甚足供

參考”。這時先生還是個在校大學生，二十六歲，其論文即蒙郭沫若賞識，予以發表，可見先生當時風頭之健。先生由此一發而不可收，很快發表了他另一篇重要論文《火浣布之傳入與崑崙地望之南徙》。所謂“火浣布”，即石棉，因為用火能去除（浣）上面的污穢，故名。按照常識，布遇火則化為灰燼，而此布遇水不濕，遇火不燼，有悖常理，因此人們賦予它很多神奇的說法。此布來自遠西大秦即羅馬，在《山海經》、《博物志》、《穆天子傳》等書中都有記載。此布究竟由何路徑傳入？這是中西交通史上一大問題。先生依據《山海經》、《博物志》、《穆天子傳》、《洛陽伽藍記》、《三國志》、《梁書》、《抱朴子》等多種古籍，參考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等成果，論證它傳入中國的時間是在東漢或以前，傳入路綫一是陸路，一是海路。關於這兩條綫路傳入的記載、傳說，互相混合，引起了中國關於崑崙傳說的南徙。這篇論文徵引廣博，邏輯嚴密，立論穩妥，顯示了先生淵博的知識和卓越的眼識。這一研究成果，很受學界重視，至今仍被相關學者引用。此後，先生沿着這一路徑，發表了《朱應康泰行紀研究》、《蘇莫遮考》、《西王母傳說考》等論文，討論的都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大問題。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又發表過《金文中所見的“僕”不是家內奴隸》（1951年）、《西漢武帝晚期的“巫蠱之禍”及其前後——兼論玉門漢簡〈漢武帝遺詔〉》（1987年）、《漢簡“曆譜”程序初探》（1998年）、《關於琅邪諸葛氏的“族姓”問題》（1999年）等。

很能體現先生治史堅實功夫的是兩部著名的工具書：《中國歷史紀年表》、《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一般史學工作者案頭或書架上都會有這兩部書。對於這兩部書，可以用三個“極”來形容：極其有用、極端無味、極為縝密。“有用”自不用說，“無味”也很好理解，治史者人人都會去查，但沒有一人會去“讀”，翻開來都是表格，沒有任何有趣之處。至於“縝密”，先生為編寫這兩部書，不知道參考了多少前人研究的成果，也不知道考證了多少具體問題，中西對

照，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不能有一點遺漏與差錯。單編寫《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就參考了司馬光《資治通鑑》所收劉義叟的《長曆》、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羅振玉《紀元以來朔閏考》、陳垣《中西回史日曆》與《二十史朔閏表》、薛仲三等《兩千年中西曆對照表》、董作賓《中國年曆總譜》與法國黃伯祿《中西年月通考》。《中國歷史紀年表》，作為《辭海》的一部分，早已走進千家萬戶，澤惠無數讀者。有些工具書的編寫，如《唐詩鑒賞詞典》、《宋詞鑒賞詞典》，既惠人，也益己，在編寫過程中編者能得到學術的熏陶、詩意的滿足，而《中國歷史紀年表》這類工具書的編寫，枯燥無味，只惠人，不益己。當然，因惠人而獲得的滿足，也是一種益己，那是更高層次的益己。

最能體現先生考據學功力、最有影響的成果是他與王修齡先生合撰的《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竹書紀年》是戰國時魏國寫在竹簡上的史書，晉代從古墓中出土。書中所述為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有很高的價值。此書原簡早已散佚，晉代學者所作的釋文也逐漸失傳。現存《竹書紀年》是宋代人重編的，不是已失傳的原本面目，故稱“今本”，由後人自南北朝至北宋從古書中輯佚編校的本子則稱“古本”。此書是對古本《竹書紀年》的“輯證”，“輯”者輯佚，“證”者疏證。書中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古代類書、古注等重加輯錄《竹書紀年》佚文，雜採甲骨金文及出土文物的資料，進行考證，將地下史料和文獻史料相結合，比前人工作更加細膩，更加準確，從而將這一研究推到新的境域，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和重視。《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有關《竹書紀年》的條目，即係先生所撰，海內外學者徵引《竹書紀年》內容，也多採用《古本竹書紀年輯證》。

考據是中國史學一大傳統，到乾嘉年間達於極盛，形成著名的乾嘉學派，涌現出惠棟、戴震、閻若璩、焦循、顧棟高、王鳴盛、錢大昕等

一批大家，產生了《古文尚書疏證》等一批不朽名著。在中國傳統學問中，考據與義理、詞章並列為三大宗，但考據居首。考據是以證據、眼識、邏輯三者為支撐，嚮來受史家推重。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對考據學的影響給予高度評價：“自經清代考證學派二百餘年之訓練，成為一種遺傳，我國學子之頭腦，漸趨於冷靜縝密。此種性質，實為科學成立之基本要素。”到了二十世紀，乾嘉學派雖然早已不復存在，但考據學的影響依然很大，且有新的發展，更加注意用地下材料與文獻材料互證，用域外材料與本土材料互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齊魯大學是考據學的重鎮，顧頡剛、錢穆、胡厚宣、張維華等都是這方面的行家裏手。在這種學風影響和師長熏陶下，方先生對考據學高度認同，自覺踐行。

通透。先生晚年雖然對考據興趣不減，但更多的精力放在對一些歷史時段、歷史事件的貫通研究上。代表性的成果是《曹操·袁紹·黃巾》（1995年）一書，以及關於三國人物的系列論文。這些論著，粗看是傳統政治人物研究，但是，仔細閱讀，會發現這是以對三國時期廣闊的世態民情深入了解基礎上的綜合性歷史研究，謂之今人所樂道的新社會史未嘗不可。先生每論一人，均叙其來歷，述其家世，介紹其地社會特點，交待其人所在政治集團中的位置，個人的氣質、嗜好、學養，敘述羣英之間的關係、恩怨，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他討論曹操與袁紹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矛盾的情況，分析這種矛盾從醞釀、發展到爆發的不同階段；分析劉備與諸葛亮的出生、家世、政治抱負，以及兩人為何能走到一起的各種原因，絲絲入扣，合情合理。最讓人叫絕的是，他能將各路英雄之間的異同描繪得惟妙惟肖，比如，他認為曹操是游俠，袁紹、袁術也是游俠，但是游俠與游俠也有所不同，有層次的高低，有氣質的相異，有的是氣俠，有的是輕俠，有的是機靈之俠，有的是魯莽之俠，有的是聰明之俠，有的是愚笨之俠。這些論著，既讓人看到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又看到他們縱橫馳騁的那個

廣闊的時代舞臺，包括政治制度、經濟結構、社會組織與精神世界，顯示出先生搜集史料、駕馭史料、釋讀史料的過人能力和卓越眼識。前兩年電視裏關於三國的連續劇、演講、說書不斷，我一邊看一邊想，假如先生在世，一定比他們都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細，理解得更深。

顯示先生治史通透功力的另一方面重要成果是關於小刀會起義的研究。這方面成果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資料集《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二是先生所著《上海小刀會起義》單行本及一批論文。《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由方先生主編，歷史所多位學者參與，一九五八年出版。此書是歷史所成立以後規劃的重大課題，由先生負責。從資料搜集的角度、範圍，對資料的編排，很能看出先生對小刀會事件的深入理解。書分六大部分：一、小刀會起義文獻；二、上海小刀會起義期間的記載和戰況報道；三、清政府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檔案資料；四、外國侵略者干涉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檔案和記載；五、其他有關上海小刀會起義的資料；六、上海附近各縣人民起義資料。先生以治樸學的思路與功夫來編寫這部資料集，不僅廣泛地搜集了檔案、方志、筆記，還在外文報紙中仔細地爬梳出大量外文資料，從而使得關於這一歷史事件的記述盡可能全面、豐滿。這是關於小刀會起義第一部比較翔實的資料彙編，為日後小刀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資料基礎。在此基礎上，方先生撰寫了《上海小刀會起義》（1965年）、《上海小刀會從縣城撤退後的鬥爭史實》等論著，這些成果，注意關注小刀會起義的各方面複雜因素，是關於小刀會起義研究的拓荒之作，在近代史學界有重要影響。

先生治史的通透功力，更多地體現在他諸多短篇考據文章中，體現在知人論世的許多獨到見解中，體現在他對史料過人的釋讀能力中。這方面例子太多，茲舉一例：袁紹曾經為曹操親征呂布，收復兗州，這是袁、曹關係中袁有恩於曹的重大事件，也是袁、曹日後翻臉曹愧於袁的一大事件。陳琳在著名的討伐曹操的《為袁紹檄豫州》文

中曾說及此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但是，記載三國史跡最重要著作《三國志》却對此事無片言隻字。是陳琳誣蔑曹操呢，還是其他原因？陳琳這篇文章被收入梁昭明太子所編的《文選》，爲《文選》作注的李善不相信此事。清代學者惠棟則認爲陳琳所說是實情。方先生對此事進行深入研究以後，贊同惠棟意見，並指出“《三國志》有許多地方爲曹操隱諱，不記載袁紹親征呂布，並收復兗州，就是爲曹操隱諱的事例之一”。^① 既能看到史書所記的內容，還能看到史書沒記的內容，並能說出沒有記載的原因，這是先生高人一籌的地方。

所謂通透，其實質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去僞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是治史能力達到極高水平的狀態。先生曾自述治史原則：“詳人所略，略人所詳”，這兩句話，其實就是通透的體現。“詳人所略”是研究前人、別人所未曾重視的問題，是眼識，“略人所詳”就是不重複前人、別人的勞動，使用前人、別人所忽略或沒有發現、沒有能力發現的資料，是功力。這兩條合起來，就是學術創新的素質。細看先生所關注的問題，諸如火浣布、西王母、玉門漢簡、西涼董氏、琅邪諸葛等問題，都是此前少人問津、資料稀少難覓的問題，經他研究以後，人們纔發現，這些都是了解中西關係、了解特定時期中國社會的重要問題。

睿智。從四十年代開始從事研究工作，到二〇〇〇年去世，在半個多世紀時間裏，方先生對學術研究一直有高度的熱情、濃厚的興趣。先生曾談到自己對學術研究的興趣：

① 《曹操——中國中古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載本書第三卷。

職業和嗜好的讀書，在那個時代（指魯迅生活的時代——引者）是很難統一的。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對我來說，讀書是職業也是嗜好，即是說，讀書既是個人的工作，也是個人的興趣，很難截然分開，因而十分喜歡讀書。如果套用魯迅的話，就是天天讀，夜夜讀，不斷地讀，在十年浩劫那個噩夢似的歲月裏，仍然偷偷摸摸地讀。道理很明白，就是除讀書之外，我想不出還有更為有趣的事。^①

如果將“讀書”換為“治學”二字，這段話對先生完全適用。先生一輩子也偶爾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有過短暫的熱血沸騰時刻，但綜其一生，他對政治運動沒有很高的熱情，很多時候是當看客，如同在遠距離地解讀歷史。翻閱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寫的一些自述，他對自己批判最多的是“為學術而學術”。一九五六年，他在一份自述裏寫道：

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當中，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着艱苦的民族解放戰爭，在國統區也在進行着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但是我在胡適思想的毒害下，竟完全無動於衷，除了發發牢騷、對國民黨的腐朽政權表示不滿以外，仍舊抱着所謂“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想，專心讀書。一九四四年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年初，齊魯大學發生過一次學生運動，驅逐代表國民黨的校長湯吉禾。這次運動我也沒有參加，專心在寫我的畢業論文《兩漢邊塞考》，思想當中還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趕走一個換來一個，還不是完全一樣！^②

①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載本書第三卷。

② 方詩銘自述，原件藏上海檔案館。

他在表面上對“爲學術而學術”持批判態度，但我以爲其內心深處並不認爲“爲學術而學術”有什麼不妥。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上海文管會古物整理處的同仁開過一個座談會，對方先生工作進行評議，就說到先生重業務、輕政治的表現。下面是會議記錄稿的一部分：^①

優點：

1. 方主任有刻苦鑽研的精神，在家中或在機關裏，都造成一個讀書的環境，為同志們樹立了好的榜樣。
2. 在領導上有條不紊，尤其對文物的政策方面是處理得相當清楚，如對文物出口等掌握得很正確，並且在思考問題時能運用馬列主義，這與方主任的思想水準、才能是分不開的。
3. 方主任在領導作風上，能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比如在嚴寒的天氣下，或不分晝夜，與同志一塊出外進行接收工作，平時凡遇比較慎重的事情，都是方主任親自出去處理。

缺點：

1. 有單純的技術觀點，怕做行政工作，因此產生在工作中有怕麻煩的情緒。
2. 在領導作風上，不善正面幫助同志們的缺點，對同志們欠缺政治教育，重感情領導，平時缺乏深入了解同志、幫助同志和關心同志。
3. 處事尚欠冷靜，往往遇有不如意的事情，易衝動和情緒波動，因此，對團結、對工作或多或少有損。

① 《文管會古整部對方詩銘同志作調離工作鑒定的記錄》，原件藏上海檔案館。

所謂“單純的技術觀點”，所謂“怕做行政工作”，所謂“欠缺政治教育”，實質上是先生對學術的重視，對政治運動的警惕，這也是從陳寅恪、顧頡剛等人一路傳承下來的學術獨立的精神體現。即使在“文革”那樣的動亂歲月裏，先生還偷偷摸摸地讀書，做研究，實在是“為學術而學術”理念在他那裏已經融入靈魂，牢不可破。

讀史有三個層次，其一是知識層面，歷史事件、人物對於讀者只是身外知識，如同工程技術，發表論著就是為了賺稿費、評職稱；其二是智慧層面，總結歷史上的是非得失，以史為鑒；其三是修養層面，知識、智慧內化為修養，陶冶性情，提升為人處世的精神境界。其一是無我之境，其二是有我之境，其三是化我之境。先生自幼酷愛歷史，一輩子浸潤在歷史之中，歷史上知識、智慧已經內化為先生的修養。先生為蜀人，從小嬌生慣養，火爆脾氣，但是，研究歷史以後，他的脾氣越來越小。他曾在一份干部登記表的“羣衆關係”欄目裏，自填“有時火氣大，忍不住要發脾氣”。填好以後，大概自覺有些不妥，又在“脾氣”二字前面插入“一點小”三個小字，這麼一改，這句話就變成“有時火氣大，忍不住要發一點小脾氣”。火氣大了，忍不住了，也祇是“發一點小脾氣”。可見先生修養之好。看到這裏，我忍不住笑了起來！我在所裏，與先生相處過程中，總感到他是那麼博學通透，溫文爾雅，那麼睿智，愈到晚年，愈為醇厚。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先生文集中有一些記往憶舊的文章，雖吉光片羽，但很有價值，特別珍貴。方先生交往的學者中，有許多是學術大家。先生對於他們的回憶，感情真摯，是研究學術史的難得資料。比如，先生記述好友童書業對先秦典籍的熟悉：

世所習知，童丕繩教授是先秦史專家，特別是對《尚書》和《左傳》兩書真是達到熟極欲流的程度。聽說他可以背誦詰屈

聲牙、晦澀艱深的《尚書》，最初我不甚相信，以為不過是熟讀而已。有一次提到這個問題，我開玩笑問及是否如此，他不作正面回答，口述“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滔滔不絕，原來正是在背誦《尚書》的第一篇《堯典》。背完以後，我真是瞠目結舌，驚佩不已。^①

書中回憶顧頤剛先生在齊魯大學的教學研究活動，顧頤剛在蘇州的生活，顧頤剛與《古史辨》，回憶聽錢穆先生授課的情形，回憶在徐家匯藏書樓查找資料的情形，都很有價值。有些趣事，極其生動。先生記述，錢穆先生上課，因為無錫口音，學生有時聽不懂，一頭霧水，鬧出不少笑話：

賓四先生講課時頗帶鄉音，蜀人初聽之下，頗有茫然之感。其後，我嘗舉以告友人史念海先生，感受相同。念海山西人，往年初聽演講時，先生多次提到“王今翁”，念海亦茫然，不知此為何人，後始知所謂“王今翁”者，實係王荊公（安石），又為之粲然。^②

先生文集出版之時，恰逢先生逝世十周年。作為先生之後生晚輩，我努力研讀先生的著作，介紹先生的成就，也學先生的樣，試圖對先生這個知識淵博、學問堅實、見識通透、極其睿智的大寫的人，進行一些解讀，淺讀、誤讀、歪讀之處，實恐難免，好在先生學術成就早有定評，已屬不朽，文集出版以後，知者、識者會有更為在行的評述；好

① 《〈童書業歷史理論論集〉序》，載本書第三卷。

② 《錢賓四先生散憶》，載本書第三卷。

在先生寬容大度，一定不會見怪，或許還會頷首稱是，我想。

謹以此文紀念尊敬的老所長方詩銘先生！

於上海社會科學院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